

北京市全员查核领导配偶子女经商

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按至少20%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查

日前,北京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北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记者了解到,从明年开始,北京市每年将按照至少20%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查。

《规定》明确界定经商办企业行为包括: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在(境)外注册公司后回国(境)从事经营活动等

情况;领导干部配偶受聘担任非国有企业的高级职务,担任外国企业驻华代表机构首席代表、代表等情况。对存在不符合上述规定要求的,《规定》要求:由领导干部督促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退出经商办企业活动,对于不按要求进行规范的,领导干部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组织处理或纪

律处分;涉嫌违法的,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根据清理规范工作的安排,今年要对规范范围内领导干部专项报告情况进行全员查核。市委组织部将会同工商、税务等部门,对是否存在虚假退出或在退出时搞利益输送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将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查核。对不如实申报,或者弄虚作假试图规避规范以及借机谋取私利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规定》对市领导干部要求严于局级领导干部,对正职领导干部要求严于副职领导干部,对公权力比较集中的部门领导干部要求严于其他部门领导干部。公权力比较集中的市委政法委、公检法系统的市管干部,参照同级别规范要求适度从严掌握,与党政部门正局级领导干部作同等要求,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都不得经商办企业。

国内国际

我首颗量子实验卫星7月发射

记者28日从中科院获悉,我国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将于今年7月择机发射,将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构建一个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

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主任潘建伟院士介绍,量子通信的安全性基于量子物理基本原理,单光子的不可分割性和量子态的不可复制性保证了信息的不可窃听和不可破解,从原理上确保身份认证、传输加密以及数字签名等的无条件安全,可从根本上、永久性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据介绍,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专项将研制及发射1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建设以4个量子通信地面站和1个空间量子隐形传态实验站为核心的空间量子科学实验系统。该卫星搭载量子密钥通信机、量子纠缠发射机、量子纠缠源、量子试验控制与处理机等有效载荷,具备两套独立的有效载荷指向机构,通过姿控指向系统协同控制,可与地面上相距千里量级的两处光车站同时建立量子链路。

量子卫星发射后,天地一体化量子科学实验系统将投入正式运行,完成包括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广域量子通信网络、星地量子纠缠分发以及地星量子隐形传态等多项科学实验任务。

潘建伟还透露,“京沪干线”大尺度光纤量子通信骨干网工程预计今年下半年交付。这一工程将构建千里级高可信、可扩展、军民融合的广域光纤量子通信网络,建成大尺度量子通信技术验证、应用研究和应用示范平台。结合量子卫星和京沪干线,将初步构建我国天地一体化的广域量子通信体系。

巡视组将进驻社科院等部门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前天发布消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将成立5个纪检专项巡视组,对社科院、体育总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10个部门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检查。

据悉,此次纪检专项巡视重点紧盯司局级领导干部、管钱管物关键岗位的干部和直属单位的党员干部等;重点检查中央国家机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存在的问题,以及各部门党员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足额、及时、主动缴纳党费等问题。

记者发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即将巡视的10个部门中,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另外8个部门都曾接受过中央巡视并进行了整改,时间跨度从2013年5月底开始的中央第一轮巡视直至2015年12月底结束的中央第八轮巡视。就在上个月下旬,接受第八轮中央巡视的中国社科院、国务院三峡办和中国农业银行刚发布了巡视整改报告。

广东江门突发山洪致死8人

广东省江门市所辖台山市人民政府29日中午披露,28日发生的台山市端芬镇凤凰峡旅游区游客漂流遇山洪落水事故中,死亡人数升至8人,其中7人身份已经确定。

据台山市市长卢永权介绍,28日当天搜救中,救回生还者6人,死亡5人,3人失踪。29日上午,搜救人员在事发河段附近发现3名失踪人员的遗体,死亡人数升至8人。暂未排查统计到新的失踪人员。

对于遇难人员,台山已成立1对1应急小组,每个小组对1个家庭,做好安抚、善后工作。伤者在台山2个医院救治,无生命危险。

“伊斯兰国”逼近叙土边境

国际救援组织估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近日对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发动“突袭”后,夺取了叙利亚与土耳其交界地区城市阿扎兹附近、由叙反对派控制的几处城镇。叙土边境至少有10万人被困。

当地记者马蒙·哈提卜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阿扎兹和阿勒颇北部的马里亚镇“开辟重要道路”,仅马里亚就有1.5万人被困,“这是一场灾难”。“无国界医生”成员巴勃罗·马尔科说:“我们非常担心,在土耳其边境与叙利亚前线之间可能有约10万人被困。”一家人权组织的成员格里·辛普森则表示,被困人员数字可能最高达到16.5万人。阿扎兹和马里亚均在2012年由反对派武装从政府军手里夺取,近几个月以来,“伊斯兰国”一直尝试进攻这两个城镇。

希腊称发现亚里士多德陵墓

西班牙埃菲社5月26日报道称,希腊考古人员在亚里士多德出生地斯塔伊拉经过20多年的考古发掘后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位大哲学家的墓。

发掘工作负责人康斯坦丁诺斯·西斯曼尼迪斯26日对当地媒体说:“我们没有确凿证据,但有强烈迹象表明了其确定性。”

报道称,从1990年初就开始在斯塔伊拉展开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在发掘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在一片拜占庭时期的防御工事赫然出现了一个建筑特点与该时期及此前风格迥异的建筑遗迹,且根据其屋顶砖块的特点可以确认曾是一个公共建筑。此外,这个建筑物底部的是一个1.3米×1.7米的长方形,与祭坛的形状吻合。

考古人员在上述遗迹中发现的所有迹象表明,这里除了是一个墓外别无他用。使专家们得出这里是亚里士多德墓这一最终结论的有力证据来自两大史料:公元11世纪被译成阿拉伯文的一部亚里士多德传记和威尼斯一个图书馆的一份手稿。

两份资料均记载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2年去世,斯塔伊拉市市民将其骨灰置于一个铜瓮中,下葬在一个墓里,并在旁边建造了一个祭坛。

“挺转”与“反转”长期争论,直到英国著名反转斗士“倒戈”——转基因农产品在欧艰难“破冰”

欧洲是世界上对转基因农产品管理最为严格的地区之一,对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一直高度谨慎。但种种迹象表明,欧洲在转基因农产品种植以及安全性认可问题上已出现了松动。

两种转基因作物获准种植

事实上,欧洲转基因农产品也并非被完全拒绝。已有两种转基因作物获准在欧盟种植,分别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MON810转基因玉米和德国巴斯夫公司的Amflora转基因土豆。此外,包括NK603转基因玉米在内的44种转基因农作物获准进口到欧盟销售,品种涵盖棉花、大豆、油菜、土豆和甜菜等。

此外,近年来,不少研究机构和科学家相继发声,既为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背书,也呼吁破除制度障碍、推动转基因技术在欧洲加快发展。

不久前,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有关转基因食品的科学指引,意在消除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疑虑。报告指出,转基因作物制成的食品可安全食用,没有证据显示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而针对转基因作物可能的环境影响,皇家学会说:“作物不会简单地因为经过转基因技术改造就对环境产生损害。”

政治因素仍是“破冰”障碍

转基因农产品在欧洲引发诸多是非,首先源于欧洲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有着特殊的“心理情结”。自英国发现疯牛病以来,欧盟区域内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在随后的“二恶英”污染、禽流感、口蹄疫等一连串事件的冲击下,欧洲人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谨慎了许多。

而转基因作物正好是在欧洲人普遍担心食品安全的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这

一过程始终伴随着质疑。欧盟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曾显示,56%的欧盟国家公民反对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食品的是非背后,还隐藏着经济利益的矛盾。截至2014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815亿公顷,种植面积连续19年持续增加,而欧洲的种植面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同的经济利益使得一些欧洲国家对转基因作物存在排斥态度。

不过在欧洲“挺转”与“反转”的长期争论中,最有标志性的是英国科普作家、著名“反转斗士”马克·莱纳斯的“倒戈”。莱纳斯曾在1996年写了被认为是第一篇“揭露转基因食品罪恶”的文章,还曾组织数十人持刀破坏转基因试验田。

然而在2013年1月,莱纳斯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自己“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行为加剧了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情绪,他

对此表示道歉,并强调“现在市面上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毒理和药理安全测试,因担心其危险而拒绝它无异于因噎废食”。

凯茜·马丁是欧洲知名植物研究机构约翰·英尼斯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长年致力转基因作物研究。她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25年里超过500个独立研究机构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进行了大量研究,至今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显示它们在环境影响和健康安全方面比传统农作物和食品风险更高。

尽管科学界在不断呼吁,转基因农产品在欧洲“破冰”仍面临障碍,特别是欧盟内部政治因素。

凯茜·马丁分析说,欧洲一些农业大国担心引入转基因农产品会损害本国传统农产品市场,因此它们一直倡导欧盟限制甚至禁止转基因农产品,导致研发转基因技术的企业纷纷放弃欧洲市场。

菲律宾首都“垃圾河”触目惊心

综合卫报等外媒报道,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一条河流已被垃圾铺满,看上去就像一个垃圾填埋场,而当地民众每天就这样在一旁来往穿梭,令人咋舌。

这条河流从马尼拉的贫民窟中穿过。

截至2015年,小马尼拉市区的人口已超过178万,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这个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马尼拉城的负荷。据菲律宾环境管理局2015年数据,整个马尼拉平均每人每天生产0.69公斤的垃圾,预计到2020年,马尼拉每年将产生超过444万吨的垃圾。

马尼拉的生活垃圾大部分会被政府定期收走,但剩下的就会被居民丢弃在河道、公共厕所等地方。不少住在河流附近的居民会用简易的木筏或小船在河流上捡拾可回收利用的物品拿去换钱。

不过菲律宾的垃圾不光是当地居民生活生产所产生,还有不少来自国外。例如,在2013年时加拿大一公司就以出口可循环塑料为名向菲律宾运送了一大批垃圾。在时隔两年后,这批垃圾终于被菲律宾处理完毕。

菲律宾即将上任的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曾许诺将禁止在马尼拉修建工厂,促进其他地方经济发展。此举或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马尼拉的垃圾污染,减轻人口压力。



“安倍经济学”正令日本中产阶级消失?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形成中产阶级队伍庞大的“橄榄型”社会。但近年来,“安倍经济学”惠及民众,造成贫富加剧,加上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保负担沉重,就业形势低迷,中产阶级逐渐向社会底层“下沉”。日本社会结构逐渐向“金字塔”型转变。

每3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无存款

日本国税厅的统计显示,2014年,日本“贫困群体”约1139万人,较1999年的约804万激增42%。安倍政府2012年底上台,到2014年短短两年时间,日本“贫困群体”又增加约50万人。

吃低保的赤贫阶层也在扩大。厚生劳动省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底,领取低保的家庭达163.4万户,总人数为216.6万人,双双创下新高。

长年关注日本社会贫困问题的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宇都宫健儿对新华社记者说,日本零储蓄家庭占比已达约30%,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5%,“如今,每3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无存款”。

零储蓄家庭激增,主要由战后婴儿潮一代老人(1946~1964年出生)“储蓄被蚕食”所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婴儿潮一代老人跌入贫困线以下。他们一方面得接济因经济低迷而收入低下的子女,又得照顾长寿的父母,这种“夹心”状态让他们原本用来

养老的储蓄逐渐见底,经济上日益窘迫。

贫富差距加大

一边是不断增加的贫困人口,另一边却是在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大企业和富裕群体财富屡创新高。

财务省的统计显示,2014年度,日本约5000家大企业留存利润达299.5万亿日元,同比增加14万亿日元,连续8年创下新高。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发布日本富豪榜显示,日本前40大富豪的总资产2015年度飙涨至15.4万亿日元,在安倍政府执政的4年内翻了一倍以上。

“铁饭碗”没了大家都是临时工

日本战后能建成中产阶级庞大的社会,终身雇佣制功不可没。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效益严重下滑,在经济界要求下,日本政府修改法律,牺牲劳动者利益,允许企业雇佣非正式员工,抛弃终身雇佣制等日本职场传统。

进入本世纪后,非正式员工数量连年递增。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显示,2014年度,非正式员工达1962万人,约占全部劳动者的37.4%,较1995年增加900多万。

宇都宫指出:“和正式员工相比,非正式员工的工资仅是其约一半,无晋升机会,在各方面遭受不公。一旦企业效益不好,他们就会马上被解雇。”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日本企业非正式员工大批被裁,被迫流落街头,引发严重社会危机。当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要求日本政府解决非正式雇佣横行问题。

日本共产党宣传部长植木俊雄说,安倍政府上台后,非但不致力于改善这一问题,还在2015年再次强行修改相关法律,进一步为企业雇佣非正式员工提供方便。

提高消费税社保负担转嫁民众
随着日本老龄化加剧,日本政府社保负担连年增加,每年需增加约1万亿日元支出,才能维持现有社会福利水平。

2014年,以弥补社保开支缺口为借口,日本政府将消费税税率上调3个百分点。政府税收增加约5万亿日元,但安倍政府只肯拨出5000亿日元用于每年增长的社会保障支出,剩下的5000亿日元缺口通过降低各项社保标准或增加民众负担等所谓“阵痛改革”堵上,造成民众在医保、养老金等福利制度上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宇都宫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将社保负担推给民众,并将税收负担从高收入群体转嫁至低收入群体。他说,近30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对大企业和富裕阶层实施减税,对老百姓增税。

以企业利润为征收对象的法人税税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约50%下降至目前的不到30%,未来安倍政府还考虑进一步下调。日本个人所得税采取累进税制,最高收入群体的税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75%,降至目前的45%。而消费税是一种对全民征收的税种,收入越低,实质税负

越高,提高消费税造成低收入群体生活更加艰难。

而令宇都宫感到惊讶的是,安倍政府一方面减少社保支出,一方面却大力增加军事开支。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国防费连续4年上涨,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

“失去”的年轻一代

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步入“失去的30年”。如今的日本年轻人,似乎也成了“失去的一代”。

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受贫困家庭增加影响,2012年,日本大学生助学贷款申请率增至52.5%,而在1996年,这一数据是21.2%。这背后是日本政府对教育支持的严重不足。

经合组织2015年底公布的统计显示,日本对教育机构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3.5%,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一。

因就业环境恶劣,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只能找到非正式工作。统计显示,20岁至30岁群体非正式员工占比高于平均水平。因工资低,很多大学生无力偿还助学贷款。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统计,2013年约有33万毕业生拖欠贷款。

宇都宫说,自杀已成为20岁至40岁日本年轻人排名第一的死因。“如今的日本社会,已成为一个年轻人无法拥有希望,拥有未来的社会。”他说:“日本社会的现实,和安倍那些漂亮的口号相去甚远。”